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 SHI

Ask

◆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Questions*

当妇女提问时

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玛丽琳·J·波克塞 著

余宁平 占盛利 等译/郑新蓉 余宁平 审校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Questions

当妇女提问时

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玛丽琳 J.波克塞 著

余宁平 占盛利 等译 / 郑新蓉 余宁平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美)波克塞著;余宁平、占盛利等译,郑新蓉、余宁平审校.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ISBN 7-201-05169-5

I. 当... II. ①波...②余...③郑... III. 妇女学-美国 IV. D4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24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6-03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1998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U.S.

作 者	[美]玛丽琳 J. 波克塞
翻 译	余宁平 占盛利等
审 校	郑新蓉 余宁平
责任编辑	黎 遥
图书设计	王 玲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电话:022-23332457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300051)
网 站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mingchan@tjrm.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玛丽琳 J. 波克塞 著

前 言 余宁平 译/郑新蓉 审校
序 许洁英 译/余宁平 审校
鸣 谢 余宁平 译/郑新蓉 审校
导 论 余宁平 译/郑新蓉 审校
第一章 余宁平 译/郑新蓉 审校
第二章 占盛利 译/余宁平 郑新蓉 审校
第三章 占盛利 译/余宁平 郑新蓉 审校
第四章 占盛利 译/余宁平 郑新蓉 审校
第五章 陆春萍 译/余宁平 审校
第六章 顾 宁 译/余宁平 审校
第七章 高晓彬 译/余宁平 郑新蓉 审校
第八章 高晓彬 译/余宁平 审校
第九章 高晓彬 译/余宁平 审校

提 介

在本书中，玛丽琳 J. 波克塞对几十年来妇女学研究成败得失的精密梳理，证实了妇女学对高等教育的长久影响，并总结出妇女学研究的诞生对高校的影响就像女权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一样深远。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女权主义者、学校行政人员，以及妇女学会的前主席，波克塞发现通过这份为妇女讨回公道的妇女学研究工作，哪怕是仅为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状态的工作，妇女即能在更多的创造、教授和积累知识的工作岗位发挥光和热。

作为一部理论女权主义—妇女学的经典著作，本书集大成地将美国学者创立、建设妇女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梳理出来，对妇女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表现出了博大的人文胸襟与终极关怀。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 1.《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
杜芳琴 著 定价：23.00 元
- 2.《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的全球与区域视界》
余宁平 杜芳琴 主编 定价：35.00 元
- 3.《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
杜芳琴 王向贤 主编 定价：33.00 元
- 4.《社会性别》（第一辑）
杜芳琴 王 政 主编 定价：30.00 元
- 5.《社会性别》（第二辑）
杜芳琴 王 政 主编 定价：28.00 元
- 6.《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
王 政 著 定价：20.00 元
- 7.《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
杜芳琴 王 政 主编 定价：33.00 元

前 言

Foreword

1872年，一位美籍非洲裔作家弗朗西丝·哈珀(Frances E.W. Harper)发表了一首诗《学识字》。这首诗讲的是南北战争后获得自由的柯劳(Chloe)大娘的故事。柯劳大娘生活在美国南方，曾经身为奴隶。为了让自己能够读“圣诗圣经”，她不顾旁人敌意的嘲讽或善意的怀疑，决心学习认字。最后，她真的做到了。作为回报，她在得到了读书认字的能力的同时，还获得了随之而来的自尊与自由的感觉。该诗的最后几行是：

然后我有了一间小屋，
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我感到了自己的独立
丝毫不亚于女王在地皇位上的感觉。

柯劳大娘的故事是美籍非洲裔男女和其他不同种族妇女争取识字和受教育权利斗争的象征。的确，她是所有为了满足读书识字的渴望而必须克服重重困难的人的代表。这一斗争的历史，是献给所有参与者的颂歌，是赞美语言和学习魅力的伟大颂歌。

妇女学这一伟大的知识教育运动是这一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学的宗旨和前提就是：所有妇女都能够接受丰富和完整的教育。如果她们愿意，她们可以成为教育者。一旦妇女成为拥有知识的人，她们便能够改变关于妇女的知识，我们的现实图像也因此会变得更清晰、更深刻、更加多元化，我们的想象力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此外，尽管

这种变化对妇女的影响将被证明是不可估量的,但妇女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思想,都将被更新、解放和注入活力。

《当妇女提问时》作为第一部关于美国妇女学的综合性论著,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妇女学这一新的学术世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不同领域不同学者的论著,如人文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许多不同群体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探讨和记录妇女的生命经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作为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领域,一个富有自我意识和活力的新兴力量,妇女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及那个十年中发生的人口、教育、社会和政治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在内的一系列运动的相互激荡。

玛丽琳·杰考比·波克塞(Marilyn Jacoby Boxer)把描述这些起源作为揭示妇女智力、教育以及妇女研究机构发展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妇女学在处理改造现有机构体制和创建自己的新体制双重任务时,采用了齐头并进的方法。波克塞准确地表示,当前,妇女学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研究中心仍在美国,因为妇女学是从那里起步的,并且很快得到传播和发展。她在作品中精辟地分析了妇女学的思想理念、教学实践和机构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揭示了关于妇女学究竟是一个系、一个跨学科的项目,还是一个学科等“学术界”的问题的意义。

从数量上看,从20世纪70年代只有数量有限的几门课程,到几十年后拥有六百多个妇女学中心,妇女学的发展非同寻常。还有一个例子,1978年,《国际博士论文摘要》(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开始使用“妇女学”作为分类索引。到1995年为止,波克塞发现,该类博士学位总数达到10786个。从质量上看,妇女学的发展更加非同一般。妇女学不仅使我们认识到自己以前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看法是多么明显的大错特错,而且创造和贡献了大量信息、重要观点和惊人的理论。过去,我们把这些有较大差异的学术内容统统归于一个统一的标题下面,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妇女学主要涉及下面的几个论题: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公平的、有害的差异、妇女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

不可避免地,妇女学学者内部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波克塞的一个优点就是她描述了她们不断争论的过程。今天,争论的内容之一,既是认识论的也是政治的,就是确定后现代理论的价值。争论的另一个内容是妇女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妇女——尽管她们之间千差万别——还是社会性别。另外一个还很不成型的、有争论的内容,就是在妇女之间的差异——至少是部分地——被揭示出来的今天,如何看待妇女之间的共性。妇女学也引起了反对意见。波克塞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她没有回避外部的批评,主张在妇女学和他的对立面之间建立更深刻的对话。

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众多的争议,波克塞有充分的理由不把妇女学发展描述成进化或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勾勒了“一个多元化、形式多样”的图景。她的这种作法,又因为她与妇女学之间的发起人关系,而极具说服力。她的个人故事在妇女学第一代学者中并非绝无仅有。20世纪50年代的她,作为一个年轻的离婚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灵魂,还有孩子,但她仍坚持学习,完成了学业,并于数年后获得欧洲史博士学位。1974年,她接受了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妇女学系主任的工作。该系成立于1969—1970年,是美国的第一个妇女学系。她现在是久经沙场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同时又以在加州高等教育机构中担任过上层领导的特殊身份,来撰写这一段历史的。作为参与者,她希望和她的妇女学同行们“横向”交流对话,而不是“代替”她们说话。作为观察者,她尊重学术规范,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出处,承认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她仔细地研究了妇女运动和妇女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写道:“妇女学不需要灌输。它赋予学生学习和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中的热情,足矣。”

波克塞的个人经历以及她身为历史学家的定位,有助于她避免用虚幻、梦境的浪漫主义勾勒任何世界,包括妇女学的世界。然而,参与妇女学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乐观主义的保育箱中——不论这一领域存在着多少冷酷、匮乏、盲目、谬误和争议。和我一样,波克塞属于充满希望的一族。和我一样,她对妇女学改进教学和改造人类社会的能力深信不疑。对她来说,妇女学丝毫不亚于一次女权主义的启蒙运动,“实现

扩展视觉空间,照亮黑暗之处,拓宽景物”。

妇女学还有更多的重要功能。它以新的思维方式激活教育的道德质询功能。它要求教育在不减少推理和钻研的同时,把“关怀、关注和关联”[这几个词是波克塞从教育哲学家简·罗兰·马丁(Jane Roland Martin)那里得到的]添加到课程内容中去。妇女学的学者应该成为“义务的人文主义者”,将学术成果转换成公共知识。如果妇女学能够发挥波克塞所说的它应该发挥的作用,“高等教育将把学者和学生所学的知识,同他们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将为所有追求知识——不仅仅是以知识作为谋生手段——的人们提供灵感,启蒙教育才有可能真正把人们从狭隘的生活局限性中解放出来”。简言之,高等教育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尊严。

和波克塞一样,我也是从妇女学的“起步时期”就加入的一分子。1969年,我开出自己的第一门妇女学课程,讲的是文学中的妇女形象。我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我们就妇女学对弗吉尼亚·沃尔夫的《走向灯塔》应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假定有这样的解释——争得面红耳赤。波克塞在她的书中,充分肯定了我的活动。为此,(我)也为了她所付出的慎重细致、范围广泛和不知疲倦的劳动,而感谢她。在《当妇女提问时》的结尾处,波克塞承认,“从事妇女学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但是,她接着又说,“当妇女学满足我们的精神追求和渴望,帮助我们吧四分五裂的生命重新整合还原的时候,它给了我们最好的回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与读者一起分享我从妇女学那里得到的收获。”我与作者在这些方面有同感,相信每一个真心诚意关心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地位的人,会从这本书中找到灵感,能够帮助他们作出更明智、更有力、更深思熟虑的决定。

凯瑟琳·斯廷普森

(余宁平译/郑新蓉审校)

序:视角

Preface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我对妇女学的认识。妇女学质疑传统知识体系,化解学科边界,帮助我们整合自己的知识、专业和个人生活经历。妇女学进入美国高等教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始于三十年前。(在那个时候)将妇女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研究的论著尚未问世,虽然现在已经有人正在开始做这一项工作。一部完整的妇女学机构史的问世,有待于一些地方性纪念文章的率先出现,如妇女学二十周年、二十五周年以及更多的周年纪念文章等。本书将追溯妇女学的起源和发展,综合探讨妇女学理论和实践等重要问题,置妇女学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读者们会注意到,本书的内容是一个见证妇女学发展的参与者根据自己当时和现在的认识,对妇女学发展的方方面面所进行的反思。我投身于妇女学,并非刻意追求。我想,很多同行们和我也许有着一样的经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我做了十年的全职妻子和母亲,重返学术界之后不久就担任了管理和领导职务,大多数时间住在加州。我学的专业是现代欧洲史,在五所高校教过妇女史。

在工作中,因为专业兴趣和志向,我第一次发现了妇女学。1971年春,我是(作为)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正在读博士学位。因为我急需增加自己的收入,学校给了我一份助教的工作,另外我自己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本地的一所社区学院教一门课。有一天,当时社区学院的系主任把一本刚刚出版的威廉·奥尼尔(William O'Neill)关于美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书塞到我手里,建议我也应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我是女性。我当即想到,应该向他提出申请,要求再教一门课,专门讲妇女史。差不多就在他批准我的申请的同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正在圣地亚

哥加州州立大学(SDSU)读书的大儿子那里听说,他们学校新建立了一个妇女学中心。于是,我去了他所在的学校,一方面是看他,一方面也想为我的新课找一些信息。当时的我刚刚开始博士学位的学习,心里正在发愁,不知自己的经济来源能否支撑自己和这个家,能否坚持读完学位。我根本不可能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1974年,我开始在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任教,并且被聘为妇女学中心主任,聘期六年。正是在那个以改革为特色的六年里,我第一次感到有必要,并且开始了对妇女学历史的研究。我当然也无法预料,这些研究会成为我今天写这本书的基础。尽管如此,我的第一步还是迈出去了,朝着学术研究与女权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方向。前者是我从第一次听到“学者”这个词时就开始梦寐以求的,而后者真实地反映了我的生活——当时的我已经熟悉并亲身体验了太多20世纪中期美国的女孩和女人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这本书的第二个,也是更“个人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是发生在一个满腔热情、满脑子浪漫思想的学生身上的真实故事。因为脑子里的浪漫思想,又没有人及时给我以忠告,我偏离了自己的学习目标。二十一岁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离了婚,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依靠。(即使那个时候已经有社会福利存在,我当时也根本不知道。)虽然我不愿意将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单身母亲,又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经历,当作妇女的普遍经历,更不用说把这些经历搬到90年代来,可是我和孩子们遭受的孤立、窘迫和被剥夺的经历,足以让我产生一个不可磨灭的信念,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社会性别状况必须改变!多亏一些好心人,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们送来食品、衣服,还有钱,帮我带孩子,给我精神上以关爱,我们才得以生存。很多年后,我的孩子们——现在是三个了——参加了我的学士学位毕业典礼。在这之后,我又经历了十年学习和教书生活,有几年是当全职学生,有几年是边当学生边教书。我教过各个不同年级的学生,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两所颇具规模的城市综合性大学做过教务主任和分管学术的副校长,前后干了十二年。

20世纪50年代怀孕的少女中,也许没有多少人能在90年代成为大学副校长。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我的视角源于我曾

有机会从多种角度观察我们的教育体制：从一个名牌大学退学的学生，到一个州立大学校长内阁的成员；从一个兼职讲师到学术预算总负责人；从一个打工的母亲到系主任。除了小学，我教过各个年级的学生，出席过无数次家长会以及和家长们在一起开的讨论会。我与教育界不同层次的人士在一起开过会、共过事。我被邀请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妇女学早期历史的评论文章，最初发表于1982年的《标记》(Signs)杂志上。那篇文章也是在编辑看到我准备的一份介绍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妇女学中心的简介材料后向我约稿的。当时我是系主任，写的材料是为了给妇女学系第一次外部评估考察时作参考。面对众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我在写上次那篇文章时就经历过，这次写这本书时又再一次努力尝试，想给读者提供一个综合的、平衡各方面因素的报告。我将用批判的目光，承认存在的问题，直截了当地陈述反面意见中常常包含着的合理内核。我甚至将承认，自己有时也曾禁止自己说出反主流传统的意见。

但是，在我动笔之前，通过大量的阅读，我对妇女学的价值与合法性更加坚信不移。我坚信，妇女学是我们世纪(指20世纪——译者注)伟大的思想运动之一，也是我有幸能亲自参与的运动。我的目的不仅是写妇女学，也是为妇女学而写。我明白，涉及有争议的内容，是很危险的。我希望本书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不仅是高校管理层和领导，他们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高教类图书的目标读者，而且包括妇女学的实践者、学者和学生，他们都会发现本书存在的某些不足。我希望这本书能对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为这个错综复杂且不断在扩展的课题竭尽全力，绞尽脑汁。1981年，我在写美国妇女学起源和发展的那篇文章时，查阅所有已经发表的关于学术界女权主义的论述似乎还不成问题。那一次读书和反思的结果，是一篇三十五页的文章，初稿有近两百条注释。今天，我无法奢望自己的书能够有如此全面的覆盖面。回顾妇女学领域爆炸性的发展史，我怀疑，已经发表的文献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通读能力。甚至，要想每天在因特网上完成交流的任务都几乎不可能了。妇女学与我作过的其他研究不同，它每时每刻都在发展，都在变化，无法把它当作一个定型的研究对象来考

察。就是在我动笔写作的时候,仍然不断有新的资料到我手上,迫使我重新评价,重新思考,有时甚至重新写作已经完成的章节。

这项研究必然受到一个作者个人习性偏好的局限。在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置身于哲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之中,使自己认识到要把握所谈到的全部内容和背景有多么困难。为梳理写作本书非读不可的书目,从琼·贝思克·埃尔施坦(Jean Bethke Elshtain)论《妇女与战争》,到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谈《社会性别麻烦》,读起来都很吃力。但是,这并不影响对妇女学了解不多的人们发表自己对妇女学的看法。每一章的内容都可以单独写一本或几本书。(有几章已经有人在写了)每一位读者都会知道与书中谈到的情况不同的例外,或不同的作法。我欢迎对细节的更正,并就辨明意思进行对话。我还想说明,书中使用的一些词有一些缺陷。写妇女学(Women's Studies),我使用的是从妇女学产生的初期就被人们使用,并且今天仍然非常流行的词。说到女权主义——不论是学术界的还是非学术界的——我没有用复数。尽管难以计数的文献都见证了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表达法,我仍然不为所动,因为复数形式别扭。但是,女权主义的多元性质不容否认。书中有几个地方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希望读者在通篇阅读时牢记女权主义的多元意义。同样,单数和复数妇女(woman/women)基本上是按照传统惯例使用的。(女权主义)第一潮和第二潮的说法,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区分或证明,只是因为大家都在用,才在书中出现。

虽然本书吸取了许多个人的研究成果,有我的同事,或者通过他们发表的著述给我以启发和指点,但是,归根到底,它反映的是我二十七年来作为学界女权主义者、学者、教师,以及在加州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毫无疑问,妇女学以及我本人从加州州立大学得到的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影响了我的乐观主义观点。我希望我的研究能为其他人提供相同的支持。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增进人们对妇女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了解,鼓励读者进一步理解妇女的生活经历和视角,推动妇女学课程及其总体设置的发展,在高等教育以及更多的领域中倡导和传播关于妇女的严肃认真的研究和教学。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想,也许这样更好。如果时机成熟,要我们评价妇女学“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1995年在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召开的二十五周年学术会议的名称——我们必须总结分享妇女学的经验。我知道一些妇女学中心已经着手准备写自己的历史。这些,加上个人的回忆录,最终将为更加全面的研究提供资料。当我们这一代妇女准备将领导权传给我们的学界女儿们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多谈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评价我们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回答批评我们的人提出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自己提问,从而帮助我们打开通向未来之路。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没有女孩会接受贬低女性智力的断言,说她们因为大脑受到限制的原因,只能对周围环境进行观察而无法进行独立的思维(这是我在大学本科的课堂里学到的一个“事实”),或者,像我当年那样,必须亲自找到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来证实一个女人可以创作出历史或哲学巨著。正是基于上述理想,为了突出妇女学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重要性,强调妇女学对高等教育的重要贡献,谨以此书献给读者。

(许洁英译/余宁平审校)

鸣 谢

Acknowledgments

从事妇女学研究多年,我无法对所有影响过我思想形成的学者、学生、朋友和同事们一一表示感谢。在此,我想感谢所有通过书或者是谈话给予我启发的人。同时,我也请求各位,如果万一在尽最大努力列举所有出处时仍有疏漏,敬请原谅。妇女学的创建真正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靠很多人慷慨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人分享,为其他的人创造机会。

在这里,我要用两个具体的例子,说明我所受到的许多惠顾。1971年,我为自己的一门妇女史课程写报告,要求课程设置委员会同意我的开课申请。由弗洛伦斯·豪主编的《女性研究 II》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该课程的申请报告得到了批准。多年之后,回想自己当年在《女性研究 II》上读到的文章,我发现,当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莫林·格林沃尔德(Maurine Greenwald)对我的启发。我现在要向她和弗洛伦斯·豪表示感谢。三年后,我正在申请我的第一份大学教书工作时,收到了一张美国史学会寄来的明信片通知,告诉我妇女史有一个教书名额。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信息。他们通知给我,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名字作为高年级研究生收在他们编的第一个妇女史学家通讯录中了。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感谢那位不知名的通讯录编撰者,她无疑是受妇女核心小组的委托,寄给了我那份通知。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把这种惠顾作为礼物送给更多的人,我希望,这些礼物在传递的过程中成倍地增长。

我还想感谢我过去的同事——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妇女学系的教授们,她们教给我她们的专业,让我懂得跨学科视角的价值,以及同事关系的重要性。感谢我的许多学生,三十年来,是他们的热情反应鼓励着我。

说到对本书作出直接贡献的人,我首先必须感谢一位高等教育的领导人乔治·凯勒。虽然我与他从未谋面,但正是由于他的敏锐,看到这样一本书的必要,而且建议由我来写。对于所有抽出时间来阅读本书稿之全部或部分的人,我表示深深的感谢。纳普尔·肖德胡里(Nupur Chaudhuri),凯茜·琼斯(Kathy Jones),贝蒂·施米茨(Betty Schmitz)和安妮塔·西尔弗斯(Anita Silvers)分别阅读了本书有关章节并提出了宝贵建议。特别要提到下面三位通读全书原稿的人。多年未曾联系的早年相识格洛利亚·鲍尔斯主动提出,我每写好一章她就帮我读一章。卡伦·奥芬是我的妇女史同行,1972年我们在巴黎市玛格丽特·杜兰德(Marguerite Durand)图书馆偶然相遇,成了朋友。她对本书提出的意见是我收到的许多礼物之一。乔安妮·费拉罗(Joanne Ferraro)和我是姐妹史学家,也是步行锻炼身体的伴侣和朋友。她将本书原稿作为妇女史,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并自始至终鼓励我,要我在学术管理紧张工作之余,坚持把学问做下去。她们三人都通过谈话和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本书把关,为我打气。同样,琼·奥巴尔也通读了原稿全文并鼓励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当然,本书的出版,少不了大量材料的采集,具体操作以掌握信息,以进行稿本创作。全国妇女学协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总是有求必应且及时并快乐地满足我的要求。伊内兹·博马(Inez Bommar),玛丽·安·欧文(Mary Ann Irwin)和玛丽·麦克法登(Mary McFadden)是旧金山州立大学中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许多职员中几位较突出者。已故的旧金山州立大学副校长秘书乔伊丝·斯坦斯菲尔德(Joyce Stansfield)担任该职务多年,从一开始她就以面对压力从容不迫的品格鼓舞着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杰奎林·韦穆埃勒(Jacqueline Wehmueeller)在本书从构思到成文全过程的每一步都提供了热情的支持。该出版社担任本书文字编辑的米丽娅姆·克来杰尔(Miriam Kleiger)也为提高本书的质量作出了贡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詹妮特·哈曼则帮助我编写了索引。

最后,我想感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灵感、知识和机会的学术女权主义者凯瑟琳·斯廷普森。1979年,我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担任妇女学系主任一职时,正值我们系的第一次外部学术评估。为了得到校行政

方的重视,我们决定邀请我们认识或知道的最优秀的学术女权主义代表。结果我们请来了由朱迪思·斯蒂姆(Judith Stiehm)、凯瑟琳·斯廷普森和迈拉·斯特罗布(Myra Strober)组成的小组。她们三人都为我们的项目奉献了三天的时间。熟悉妇女学领域的人都会为我们感到荣幸。

那次评估,以及为确保妇女学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继续兴旺发展,促使我写了一篇关于妇女学发展的文章,登在《标记》杂志上。这篇文章是最终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动力。虽然斯廷普森时间紧,工作异常繁忙,但是在为本书写前言的过程中,她再一次展示了对妇女学永恒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妇女学得以兴旺发展的基础。

我感谢目睹了我身兼母亲、学者、行政领导和养家糊口等数种身份的朋友们;感谢没有只把我当成一名官僚机构中的成员,而是和我成为朋友的各位教授们;感谢一贯坚定地爱我和支持我的家人!希望这本书没有辜负这么多人的帮助和贡献。

(余宁平译/郑新蓉审校)